

[了解伊斯兰文化]

# 全球软环境治理与媒介霸权主义

——从“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谈起

马 丽 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 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制有利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控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其中, 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议题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重中之重”, 由此引发了因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 并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巨大挑战, 影响并制约了全球软环境治理。

**关键词:** 全球软环境治理; 媒介霸权主义; 伊斯兰恐怖论; 中国威胁论

中图分类号: D5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08)03-0114-07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 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制有利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控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所了解和接受的国际重大事件, 大多掺杂了西方霸权政治与霸权学术的立场和观点, 并通过西方传媒所传播给定的、不免带有西方霸权主义的特有素质, 臆造、妄论甚至制造同意是其最常见的霸权行径, 对目标国或敌对方尤其如此。其中, 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议题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重中之重”, 由此引发了因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 并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巨大挑战, 影响并制约了全球软环境治理。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发达经济及文化优越感, 尤其是强势的传媒技术和先在的语言优势等是构建霸权话

语的外因的话, 西方的政治家、学者和传媒的苦心经营则是构建霸权话语的内因。在内外因相互作用下, 共同制就了一个有利于西方大国的舆论环境, 其宣传策略是从新闻语境和人文语境中剥离出政治语境, 破坏了国际政治的民主性, 西方霸权语境便统驭全世界。美国既是此种语境的主要始作俑者, 更是其最大受害者。

在基辛格看来, “好战的穆斯林是对国际秩序最迫在眉睫和最显而易见的挑战, 核扩散是对全球生存的最长期和最隐匿的威胁”<sup>[1]</sup>。因此, “反恐”与“防核”对国际秩序构成双重威胁。但他更认为, “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完全是另一国家领土范围内事态发展的威胁”。因“9·11”的刺激, 布什政府怀着复仇主义的政治冲动, 强行向中东地区倾销美式民主以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尽管这种政治霸权行径遭到阿—伊世界的普遍抵制且成效甚微, 但为配合“大中东战略”的推行, 不仅白宫官员在重大外交场合高调宣扬这一战略思想, 还责成“美国之音”等主流传媒增加使

收稿日期: 2008-07-02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资助项目前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马丽蓉(1966—), 女(回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副所长, 《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 主要从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东问题研究。

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节目,向中东地区展开舆论攻势;亨廷顿早在“9·11”前就预言“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sup>[2](p234)</sup>。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毋宁说是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全球方略,旨在维护西方话语主导下的霸权秩序,“9·11”事件就是被西方传媒渲染成了一场“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媒体不断地讲‘9·11’改变了一切……如果没有电视的这种实况转播,没有电视拍摄的这些节目,没有卫星联网、有线电视及进入每个家庭,‘9·11’传播的效果能是这样吗?‘9·11’一共死了2700多人,全世界天灾人祸中比这个大的灾难多不多?当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25万人,美国投向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有20多万。为什么别的灾难没有改变世界,而这个灾难改变了世界?是美国媒体改变了世界,而不是这个事件本身在改变世界。”<sup>[3](p180-181)</sup>而且,“恐怖袭击、电视画面带来了空前的新闻话语霸权,促使美国站在更高的道德、感情的高地上,强化美国统治世界的合法性。”<sup>[3](p189)</sup>不仅如此,“9·11”后的全球传播一直弥漫着恐怖的阴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媒在报道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时,向世界传达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且审查和自我审查又将美国非常危险地转变为“一个国家,一种思想”<sup>[4]</sup>，“文明冲突”成为国际传媒的重要甚至全部的报道议题,而全球变暖、能源匮乏等重大全球性议题都被忽略。媒体和政治的斗争愈演愈烈,国际政治中媒体、舆论和政治间的较量日趋激烈,凸现出西方霸权语境的如下几个特征:居高临下的话语态势;单向度的话语流程;武断臆造的话语内容;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利益制约的话语目标。

惯以犀利无情揭露美国传媒的美本土学者H.席勒(H. I Schiller),在其《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认为文化(或媒介)帝国主义是“近代殖民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延续”。在其成名作《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中,他又揭露了由政府、军界和民企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促成了美国传播凌驾全球,并导致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丧失的事实。文化(或媒介)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国外国内媒体的结构与内容,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sup>[5]</sup>。席勒学说强调西方大国借助强大的实力控制了文化输出权,经由大众媒介向外灌输,造成第三世界母语流失、传统瓦解、认同危机、集体失语、形象遭损、声誉被毁……媒介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了一个特殊管理者。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下拥有强势传媒,以引导全球主导性议题、设置特定的传播框架以及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等方式掌控了国际传媒的话语霸权,产生了无法匹敌的传媒影响力,从而凸现出文化帝国主义本质。从某种程度上看,西方大国控制了文化输出权也就控制了话语权。而福柯在揭示西方依借超强软

硬实力建起“合法性”来对“他者”文化进行控制和统治的真相时,即从“话语功能”剖析中获得了学理性突破。在他看来,“话语”就是对展示出某种外在功能的符号系统的称呼,话语在“话语—世界”的层面上展示出功能,即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话语的功能性展示于“话语—话语”层面而不再是“话语—世界”层面;话语的功能是在“话语实践”中对话语网络的形成所起。

因此,西方政治家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西方学者精心贩卖“文明冲突”论,政治霸权与学术霸权相互推动,借助现代传媒向全世界传播,而由西方掌握传播权的国际传媒也只能循着西方政治与学术的霸权思路来报道重大国际事件,霸权语境便水到渠成般的形成了,其对国际社会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见的:第一,侵犯了公众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知情权。由于信源的被垄断,影响公众接受全面、准确和公正的信息,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发挥真正效力。因为,各国政府决策重大国际事务的信息基础只有西方所灌输的霸权信息。第二,制约了国际传媒报道的客观、公正性。对利己与异己群体采取美化与贬损不同的报道框架,背离了新闻真相。第三,遮蔽了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丰富性。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现实真相,但西方传媒所统摄的国际主导话语却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对处理全球化时代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极大危害。

可见,冷战时代虽已结束,但国际传媒领域的冷战格局依然存在,造成了西方霸权话语主导下的全球传播现状。其中,“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即为西方霸权语境中的典型产物,折射出后冷战时代由西方政界、学界和传媒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所“表现和生产文化、规范、政治力量和相应的军事及人文现象的世界体系,具有一种已成为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制造出超出实际的国际形象,来引导国际范围的社会话语和过程。”<sup>[6](p441)</sup>

## 二

事实上,西方政界、学界和传媒联手制造的“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并在贬损异己的过程中制造出超出实际的正面的美国形象。

西方传媒大体历经想象化→类型化→丑恶化→妖魔化→恐怖化的演绎逻辑而臆造了“伊斯兰恐怖论”: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最初想象是建立在沙漠游牧民族这一基点上的。但二次大战后,西方人心目中的阿拉伯民族是“从骆驼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粗略模糊的原型形象变成了代表着无力与易败的漫画式形象:这就是人们对阿拉伯人的全部想象”。更为不幸的是,在“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人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显得更具威胁性。卡通中不断出现阿拉伯酋长站在油泵后面的形象”<sup>[6](p366)</sup>。而这种静态的、含沙射影式的表述遮蔽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潜在能力和历史过程,导致阿拉伯-伊斯兰形象沦入臆想甚至类型化之中;由个体形象的人物出场到群体充塞的场景描述,甚至将反犹太主义的个体目标置换为排阿主义的群体对象,这是西方

传媒肆意丑化阿拉伯—伊斯兰形象的基本路径,而巴以日趋激烈的冲突和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等外在因素更将此种丑化推向了极致;当“妖魔化东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乃至学术倾向等逐渐渗透到大众传媒的各个方面时,便出现了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简单粗暴地加以表述并制作出大量的反映愚蛮的赶骆驼的人、恐怖主义者和盛气凌人的阔酋长的电影、电视节目等,借此向人们不断灌输由发达的传媒技术所塑造的纵欲、懒散、宿命论、残忍、堕落等影画形象,为西方人在那里攫取能源和发动战争寻找借口;自苏联解体后,西方传媒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东方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邪恶帝国。其结果是,各种媒体中到处充斥着欲将阿拉伯—伊斯兰形象推入恐怖深渊的明显倾向。尤其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炮制和“9·11”事件的发生,不仅使美国政治思潮走向了极端化,还使西方传媒所鼓噪的“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更使美国传媒越来越受制于政府。更何况,“欧洲对伊斯兰的兴趣并非来自好奇,而是来自对伊斯兰这个一神论的、在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令人生畏的欧洲基督教的竞争对手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敌视相混杂的情感一直延续至今”<sup>[6](p44)]</sup>。美伊战争后,美国加快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新战略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传媒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报道立场与表述方式,与此相关的话题更被蒙上了恐怖的阴影。其中,在如下几个国际传媒热点议题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伊斯兰妇女问题;耶路撒冷问题;“9·11”事件;伦敦连环大爆炸;“阿拉伯民主之春”;“儒伊联手威胁世界”说;等等<sup>[7]</sup>。因为,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及其传媒“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sup>[8]</sup>从二战前→二战→冷战→后冷战时代,西方传媒历经想象化→类型化→丑恶化→妖魔化→恐怖化的演绎阿—伊世界的持久过程,或公开或隐形地在长达近百年的传布实践中“重塑”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相相去甚远的一个臆设形象。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并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冷战后“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均在此大背景下问世的,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拨“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大成者;“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则是在1998—1999年间。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更使“中国威胁论”登

峰造极;第四拨“中国威胁论”更具实质性: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等,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被西方媒体大肆炒作,使“中国发展水分论”大行其道。稍后,美国经济记者戈登·尚出版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国崩溃论”逐渐流行,对中国过分“关注”起来。2006年,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强调要通过“增加美国的国民储蓄和增加中国的国内消费和人民币汇率弹性”来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2007年1月,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维克托·托马斯在《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文中强调“人们需要不断提醒这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责任已扩大到整个地球”。其实,进一步深究后发现,西方传媒一直以“救世主”的潜念居高临下地传布在他们看来极需拯救的、愚昧、落后的中国形象。尤其是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所以要美化中国,旨在以一个正面的、强大的“美好中国”去对抗苏联。为此,传媒主要采取避开政治、专谈风土的猎奇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西方受众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巨大好奇;90年代前后,西方传媒由美化中国形象趋于欣赏“丑陋的中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讲述旧中国老儿女的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这是西方电影评委对中国“审丑”情结的集中表露;近年来的和平崛起已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作用,这无疑对竭力推行全球霸权的美国而言影响极大,如何尽快铲除异己政治的中国便成为白宫官员的要务,也成为美国各大传媒的“政治任务”。可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传媒美化→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及其方式是昭然可显的,但对长期不明真相的、多年被动接受传媒灌输的普通的西方受众而言,他们的想象推理也只能是如此简单的臆想式过程:赤色分子→共产党→共产党国家中国→国民愚昧、政治专制、经济落后→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全世界的安全→红色与暴力→“赤色威胁”→全球仇儒恐中……西方传媒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不断贬损着“中国形象”,并从以下几个典型议题的新闻炒作中凸现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特性: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中国制造”问题(玩具质量/食品安全);“北京奥运”政治化;“3·14”拉萨事件;CNN辱华案;等等。

在竭力贬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诋毁中国形象等异己力量的过程中,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则联手合作,精心培育有利于美国海内外形象的舆论环境。为此,治愈了“越南综合征”后的美国政府精心为国际社会相继塑造了如下几种“美国形象”:两伊战争中的“中立者”形象、海湾战争中的“救世主”形象、反恐战争中的“受害者”形象。亦即,美国传媒从越南战争的越位报道致使总统下台→两伊战争的封锁消息暗合政府战略→海湾战争的公开配合变为参战利器→反恐战争的煽动民情进而鼓动开战,“美国形象”也在越战后相继塑造造成中立者→爱国者→受害者,而美国在海外战争

史上的国家形象又折射出美国政府汲取越战教训逐步控制传媒的事实真相,暴露出美传媒陷入“新闻自由”与“政府意志”难以调和的窘境。因为,美国人从越战得到的最大教训恐怕是:“现在战争的主要手段就是宣传战,胜负因国际舆论而定。谁赢得了宣传战,谁就是胜利者。”<sup>[9](p203)]</sup>尤其当传媒与政府没有发出“一个声音”时,政府和军方就该对传媒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操纵。结果,从海湾战争起,美国政府连军事新闻都要进行严密审查和控制,受众完全听命于由政要、传媒和学者联手制造的舆论的牵制,逐渐沦为传媒的囚徒。尽管“第四权力”是美国新闻界的无冕之王对媒体的自诩,是相对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权力而言的。从表面上看,美国的传媒运作看似十分自由,但实际上却受制于法规律令的严格约束,不仅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限制了这种“自由”,而且《美国新闻管制条例》里还规定:“在未来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后者包括本国和西方国家以及一切亲西方的无冕之王们。”一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下令成立“公共新闻委员会”,负责发布战争消息,充任政府与传媒间的联络员,以防乱发消息,动摇民心或影响战争进程;二战期间,美国又颁布了《美国报纸战时行为准则》,将新闻媒介严格纳入战争轨道;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于1951年颁布的《新闻检查条例》完全捆住了美国各大传媒的手脚;越南战争期间,传媒将政府搞得狼狈不堪的“教训”促使美政府加强了传媒监管,限制了传媒的新闻自由。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军方就出台了《战地记者手册》,对记者的采访和发稿权又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不得有违……不仅如此,美国传媒的影响力还直接与其背后的经济实力成正比。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政治竞选的费用暴涨了三四倍,主要用于购买各大媒体上昂贵的宣传广告。事实证明,美国的主要传媒依凭巨大的资财掌握了“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利,通过对消息来源和新闻素材的选择取舍,“引导”或“转移”受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受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只不过,在国内政治上,美国确实有其“公民社会”的良性体制,各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权势人物或集团很难长期垄断和封锁主要的国内新闻议题,这易给外人造成“言论自由”的某种错觉。但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外议题”上则表现出和政府外交政策及“国家利益”间惊人的一致性,尤其采用封锁甚至误导新闻议题的方式对国际问题实施“政治挂帅”。可以说,海湾战争,不仅使“传媒与政府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几乎消失”,也使美国意识到不但要管制传媒,而且要充分利用传媒,使其最终成为参与战争的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9·11”事件的发生,令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遭受空前的挫伤,也使美传媒从这场灾难的废墟中寻到了搭建道德金字塔的材料。秉承白宫意愿的传媒抓住扩延于民众中的“受害者”心理,竭力为“先发制人”的非道义之举大造舆论,使得美主流传媒残存的新闻客观性也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爱国主义”激情所淹没,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非法”与伊拉克萨达姆的“邪恶”不断升级的外因刺激下,

“反恐”遂成为美国上下最强烈的意愿和呼声。一时间,“萨达姆”、“屠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格达”等词语频繁出现在美国各大传媒上,目的就是妖魔化萨达姆及其政权,宣传攻打伊拉克是“行使正当的执法权”。美国民众对动武的支持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就与美国传媒在战争前、后的倾向性报道甚至新闻造假有直接关系,“随着战事的进展,有些报道就越来越不像话了,特技镜头、合成照片等高科技大显身手。特种部队营救女兵的杰出作品已是世人皆知的了。美军进入某城市后受到‘伊拉克人’的欢迎镜头也只是有数的几个在轮番播放……”<sup>[10]</sup>经历了“9·11”事件的美国,其媒体与国家战略部署更是保持了高度一致性。<sup>[11]</sup>因此,“一个政府要想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影响和赢得民意,需要利用和开发现代媒体带来的软资源,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从而形成自己的软力量优势。如果不能适时地调整到现代媒体舆论环境下,这个国家、政府或党派组织将在舆论和民意上处于劣势。美国政府吸取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在美国与国外发生冲突时,美国政府特别注意在海内外培育一个支持政府政策的现代媒体环境”<sup>[12]</sup>。

可见,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中国问题的基本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国际传媒的新闻报道,尤其是那些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国际传媒。因此,西方主流传媒对此类问题的确认与传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既可充当一般传播中介的角色,还可对此问题起一种“定型”甚至“定性”的作用,其报道的议题和方式都会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受众对此类问题的评价和定位。西方强势传媒所鼓噪的“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正是其在“重塑”美国正面形象的过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使然,表明西方传媒可信度的惊人缺乏缘自霸权主义统摄新闻的可怖事实。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学说就旨在揭露西方通过带有明显偏见的、对东方形象标准化和类型化模式来“妖魔化东方”的事实真相,且这种“妖魔化东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乃至学术倾向已渗透到大众传媒的各个层面。

### 三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妖魔化东方”的不幸后果之一是,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是模糊的,阿拉伯—伊斯兰形象在中国也是不清晰的。结果造成了“一个触目惊人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同情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但是,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网民已经大部分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他们公开在网站论坛上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强烈抨击中国媒介有关中东问题的报道立场,对客观报道巴勒斯坦问题的记者进行人身攻击,极力贬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对美国和以色列充满了同情、崇拜和支持”。而这一怪现象的出现,“固然和中国当代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发生剧烈变化有关,与西方媒介控制和左右世界信息渠道有关,但也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宣传不力,尤其是对华媒介公关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sup>[13](p34)]</sup>而台湾等敏感问题仍会干扰到中—阿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也与中

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宣传力度不够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中—阿双方都应高度重视在国际舆论中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此,汪道涵先生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创建之初就强调“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sup>[14]</sup>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西方传媒的霸权语境中,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分别被臆造为“红祸”与“绿祸”,尤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9·11”事件的爆发,西方传媒不但借“人权”来贬损中国形象,而且借“反恐”来诋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将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抑或是二者的联手视作西方最强劲的威胁,且武断地认为:“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sup>[21](p.266-267)</sup>因此,在研讨“新世纪中阿合作的战略基础”、“中阿合作的动力和阻力”以及“中阿合作中的学术交流作用”等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时,切不可忽视由西方传媒的国际传播政治性所致而严重阻碍了中阿沟通与合作的严酷现实。特别是清理西方传媒语境中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臆造的历史过程、表现特征及其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进一步澄清“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等问题真相,尽快清除中阿文化沟通中的强权干涉,以儒、伊文明的进一步沟通来促进中阿之间的务实性合作,尽快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以减少或铲除中—阿沟通、合作中的“西方传媒”的干扰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政府应高度重视软国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

众所周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国力(软实力)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尤其包括该国的国际形象、民族士气和精神面貌等。西方国家凭借传播的超强力量、英语的先在优势等历来重视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美国更是如此。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看来,“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在“9·11”事发后,美国主流传媒鼓动政府开战复仇,已成为空前罕事而令人瞩目。布什总统又签发总统行政令,专门创建了全球传播办公室(The 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旨在争取全球反恐的国际舆论、修复美国对外形象。美国在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时十分重视国际舆论的精心打造,甚至近年来频频打出灾难外交牌,赚取了世人不少的同情,如美国两任总统亲自出马为东南亚海啸筹募捐款就是明证。同样,以色列也极为重视对外宣传,形成了一整套的媒介公关策略,尤其注重对华宣传。其中包括“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驻以色列和中东地区记者交朋友,使其在到达以色列前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亲近感”、“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媒介负责人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长期保持联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以色列在中国的院外集团”、“通过外交官的广泛社会活动,大量接触中国各阶层,频繁在中国媒介中曝光,树立国家的形象”、“跟踪媒介报道,并进行适当交涉”及“资助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等<sup>[13](p.34-36)</sup>。必须承

认,因种族、宗教乃至政治等固有偏见所致,西方传媒往往宠爱以色列人而冷落阿拉伯人,对牵涉阿拉伯—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报道乐此不疲,极尽歪曲之能事。因此,中阿双方都应高度重视在国际舆论中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此,汪道涵先生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创建之初就强调“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如何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sup>[9](p.252)</sup>。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其次,传媒应更加专业化,力争早日发出“自己的声音”。

显而易见,“半岛”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专业化的精心打造,“从选题的策划、议程的设置、现场画面的拍摄到后来决定采访哪些人全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不是跟随CNN”<sup>[9](p.306-307)</sup>。亦即,在借鉴BBC的运营经验时仍坚持阿拉伯—伊斯兰的报道立场;独家抢发或以独特视角报道有关中东地区的重大事件;尽量传布来自事件发生后双方的第一手资料以供受众更加客观地进行评判;采集不同信源的信息以构建多重报道语境来抵制西方传媒单一的霸权语境。尤其是,西方传媒并未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放在多重语境下进行客观、平衡的报道,而是植入政治的、复仇的、非常态的语境中进行霸权主义的报道,美国传媒更凸显出霸气十足的话语风格。尤其在“9·11”后,美国传媒上高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语汇,如“反恐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国”、“文明冲突”、“恐怖分子”、“大中东战略”、“劫持民主”等正式进入美对外政策话语系统,逐步取代了旧的对外政策模式中的语言表达,此类话语帮助美国霸权者阐释并建构着“9·11”后国际新格局、世界安全新现实乃至国际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当然,与之相应地也出现了对抗霸权话语的新的政治语汇,如“圣战者”、“人体炸弹”、“虐囚丑闻”、“反美武装”、“遏制哈马斯”等也不断出现在“半岛”等非西方传媒上,力求借此摆脱西方霸权话语统治下的“失语”窘境。在“半岛”成功专业化的鼓舞下,“央视”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如成功报道伊拉克战争、出色完成“西藏四十年”和“新疆五十年”等敏感专题的报道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央视”正在向媒体专业化方向快速发展且成效渐佳,值得期待。

最后,国际问题研究应更加务实化,力争使研究和传媒达到互动。

不容置疑,尽管国际传媒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不是直接发生作用,但它对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深远影响是确实存在的,甚至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密不可分。在我们日趋依赖国际传媒来了解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今天,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不能回避“国际传媒”这一重大制约因子,尤其在进行中阿问题的研究时,更不能回避西方传媒严重干扰这一立论现实。因为,西方传媒负面性的新闻报道,不仅影响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不少执法部门官员对中阿民众的偏见性公务处理,还影响到西方影视、出版、学术等行业偏激的评述。如美国传媒爆炒达赖、法轮功和李文和案、英国当局对“拉士迪事件”的粗暴处置、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形象

的消极塑造等。尤其是西方学术界在竭力贩卖“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野蛮与暴力是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是一种不容纳他人的、种族隔离主义的、中世纪的、狂妄的、残忍的、反妇女的宗教”<sup>[9](p42)</sup>等所谓“专业水平的”有关中东学问的同时,西方传媒中的所有讨论文字、框架、背景都受到此类思想的限制甚至定性。这种渗透于研究界和传媒圈的霸权话语体系所派生出的被放大的“伊斯兰威胁论”已在全世界各大传媒上不断滋蔓,而随着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整合”步伐的加快,美国传媒对国际传媒的霸权话语影响也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威胁论”也会伴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而继续蔓延,一项对美国几家主流媒体的统计发现,“从标题看,50%是比较敌视中国的,25%是中性,25%稍微有些善意。如果按字数看,90%以上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的文章既长,又看起来下了功夫”<sup>[9](p25)</sup>。因此,国际传媒与国际政治的如此契合也将中阿问题引向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沿。国际问题研究必须与国际传媒由隔离走向互动,力争充分发挥智库服务于政府的务实作用。可喜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已初步建成了媒体、学术和政策三边互动的新构架。

尽管卡塔尔的“半岛”与中国的“央视”已在国际传播的媒体比拼中大有作为,但东西方传媒失衡的发展现状所产生的迥异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严重阻碍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尤其阻碍了中—阿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深入合作。唯有逐步揭穿西方传媒所臆造的“绿祸”甚至“红祸”的文化霸权主义本质,才能更好地实践“中阿合作论坛宣言”所倡导的“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特性,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呼吁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营造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sup>[14]</sup>。因此,对西方传媒在中—阿合作中阻障作用的学理性考察,既体现出遭遇“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论”的中阿双方需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的紧迫性,又凸显出网络时代非西方、非英语国家需不断强化文化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一要大力弘扬悠久的历史传统,积极宣传本国的文化形象,坚决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二要积极应对网络文化渗透的严峻挑战,坚决抵制“数字化侵略”和“信息殖民化”;三要尽快完善文化安全预警制度,全方位监管可能危及文化安全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我们在积极致力于降低美国因素对中阿双方国家形象产生严重销蚀力的过程中,更应全力构建文化安全战略,充分发掘儒伊文明相互理解的文化资源优势,力争使中阿双方在文化沟通基础上的经济合作继续深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四

正如约瑟夫·奈告诫布什政府的那样,增强软实力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但美国政要、学者与传媒却在合谋而就的霸权语境中肆意贬损异己力量、强力打压异己声音、随意判定世界公敌、任意将美国问题提升为世界问题,最终达到统驭世界舆论的目的。结果,话语霸权成为政治霸权的基础,政

治霸权又强化了话语霸权。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蓄意制造与长期坚持。一方面,美国借“9·11”事件所捕获的道德制高点来以“反恐”之名乘势控制拥有能源的中东地区,另一方面,欲借北京申办奥运之际来将体育赛事政治化而遏制不断崛起的中国。其战略考量显而易见:一是将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输掉的软硬两实力的损失转化为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软硬两手遏制,以达到缓解国内外压力的目的;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传媒所造成的国际传媒冷战格局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严峻挑战,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更对当今国际关系构成巨大挑战,并主导另一种全球化。亦即,如果说主要是以全球资本为主体的力量正在通过将部分职权转移给超国家组织的民族国家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正在挪用资本创建的传播技术来从事“另一种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sup>[15](p25)</sup>。而且,在媒介霸权主义日益影响全球软环境治理的现实中,美国、伊斯兰世界及中国这三大国际形象已构成目前全球软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因素,并对全球化发展前景产生着重大影响和制约。对此,约瑟夫·奈撰文预言:美国、伊斯兰及中国这“三因素决定2020年世界大势”。据他披露,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公开描绘了2020年世界的四种迥异图景:“达沃斯世界”——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但亚洲面孔会现得更多;“美国主导的和平”——美国会继续塑造国际秩序;“新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宗教教义将挑战西方社会准则的主导地位;“恐惧周期”——非国家力量带来的安全冲击,将导致失去人性的极权社会。哪种情况最可能发生?科技变革将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但中国、伊斯兰及美国这三个因素将决定政治结果。据此,约瑟夫·奈作了进一步分析和判定:首先是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就将主宰世界”,但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其人均收入仍只有美国的1/4。虽然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可能与美国持平,但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可能是中国的4倍。对中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仍是其自身的发展。自1990年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还有4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与印度不同,中国还未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如果中国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黏合剂,那么它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好斗的外交政策。或者,它也可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并在世界政治中成为布什政府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政治伊斯兰”及其发展方式,将构成第二个因素。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一场内战。激进的少数伊斯兰群体正利用暴力,把一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拥有更多不同观点的主流人群。虽然绝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亚洲,但他们受到了来自斗争核心中东的影响。而在全球化、开放性、社会制度和民主化方面,中东都已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开放贸易、经济增长、教育、公民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程度的逐渐提高,可能会有助于增强穆斯林主流的实力,但欧美对待其

穆斯林族群的方式也同样能产生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是令主流穆斯林满意,还是会强化激进分子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言论?第三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的实力以及它的使用方式。到2020年美国仍将是强大的国家,但问题是,自罗马帝国以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靠单独行动来保护其公民了。美国的军队可能不足以应付全球性传染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等威胁。这些问题需要合作,以及吸引支持力量的软实力。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威慑、联盟和稳定仍至关重要,但如果用错了地方,就会削弱赢得胜利所需的软实力。迄今为止,有情报显示,因美国政策而涌现的新恐怖主义分子,要多于其消灭的恐怖主义分子。关于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将是美国能否恢复其曾经在冷战中拥有的能力: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变成某种巧妙的力量。因此,如果这三股力量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将是相对乐观的结合,即有着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和平”<sup>[16]</sup>。

可见,以“伊斯兰恐怖论”和“中国威胁论”为例来分析全球软环境治理与媒介霸权主义,极具现实意义与学理价值。而且,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性问题,已对全球化进程构成重大冲击,并派生出如下重大学术话题。

第一,话语霸权成为政治霸权的基础,政治霸权又强化了话语霸权。亦即霸权与霸权话语形成共生关系。

尽管国际传媒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不是直接发生作用,但它对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深远影响是确实存在的,甚至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密不可分。在我们日趋依赖国际传媒来了解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今天,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不能回避“国际传媒”这一重大制约因子,尤其在进行中-阿务实合作时,更不能回避西方传媒干扰的严酷现实。因为,西方霸权的负面性的媒体报道,不仅影响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不少执法部门官员对中阿民众的偏见性公务处理,还影响到西方影视、出版、学术等行业偏激的表述与评定。西方话语霸权已对全球舆论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并影响到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形象建设;西方话语霸权激化了文明间的冲突,严重阻碍了全球化时代异质文明间的对话与沟通;亨氏的“儒伊文明的联手将是西方最大威胁”这一霸权性判语被政治家玩于股掌之间,在贬损异质文明中觊觎着“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而这种渗透于研究界和传媒圈的霸权话语体系所派生出的被放大的“伊斯兰恐怖论”与“中国威胁论”已在全世界各大传媒上不断滋萌和蔓延,拥有能源的中东、不断崛起的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话语霸权的核心议题,就与美国的对阿、对华政策及其全球战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二者互为因果。

第二,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国家形象的美誉度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正面的国际形象就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国力(软实力)这一概

念,主要是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尤其包括该国的国际形象、民族士气和精神面貌等。西方国家凭借传播的超强力量、英语的先在优势等历来重视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美国更是如此。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看来,“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个美元”。相比较而言,中国软实力发展中的盲点之一是,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缺乏强有力的预警应对机制,常以“撞击反射”的方式被动处理国家利益因此受损害所带来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但是,在“3·14”拉萨事件、CNN辱华案等相继发生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力,在发掘多元文化资源和谐质素的过程中积极拓展民间外交空间。同时,鉴于汶川地震报道的成功经验,不断开放政府与社会的资讯透明度。其实,早在2006年12月,政府就公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取消了境外媒体采访的限制。一方面,可根据西方记者采访的兴趣点,主动设置新闻议程,借他们的采访将一个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中国向世界传播,增加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国报道的客观、公正、准确性。另一方面,中国主流媒体应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将中国问题有机纳入全球一体性范畴来设置新闻议题、确立报道框架,并用世界普遍可以接受的话语方式进行报道。唯其如此,“中国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被动局面和在世界舆论中没有话语权的局面才有可能改变”<sup>[17]</sup>。在百年奥运之际,确保国家正面形象的集中展示,就在更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

第三,冷战后国际制衡逐渐趋于软性化,软硬两方面的遏制与反遏制影响各国软硬两种实力的发展,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

冷战时代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依然影响着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尤其因国际传媒冷战格局所致的西方媒介霸权主义已对全球化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冷战后国际行为体间的制衡与反制衡日趋软化,国际关系与国际传媒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存的互动关系:“传播媒介传播了大量信息,它们是各国政府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通道,也是各国外交决策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泉。反过来,各国政府亦利用传播媒介向世界传递信息、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以求赢得政策的主动,促成实现各自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目的,从而使大众传播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领域。”<sup>[15] [147]</sup>因此,公众舆论便在某种程度上跃升为一种政治力量,亦即在“外交政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sup>[18]</sup>。因此,西方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而“公共外交”则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公共外交比起我们熟悉的“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丰富。通过公共外交,可更

直接、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决定于本国国情,也受制于国际环境,这不仅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等,也包括国际舆论环境。

第四,非传统安全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应在立足国情和輿情基础上强化国家媒介主权意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非传统安全涉及国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等诸多领域,日益影响着当前的全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有学者认为,此次西藏事件报道后的中国舆论反弹,就体现了中国民间国际话语权意识的觉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铁路修建、资源开发等问题上,部分西方媒体都进行了“选择性报道”,建立了特有的西藏“框架”——一种政治与民族对立的框架。任何关于西藏的新闻,都被放到这个意识形态框架下进行报道和评判。

由于中国集中精力在经济上追赶世界,更多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到这种话语权可能给中国发展带来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更不用说争取国际话语权。但随着80后网军抗议西方媒体所迸发出的民族主义激情,一种强烈的媒介主权意识开始在中国民众中逐步形成。中国人正在意识到,全球化时代文化领域的主权观念已经远非物质边疆那么简单。在文化主权的捍卫过程中,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发言权。由“3·14”拉萨事件所引发的CNN辱华案已经证明,全球华人维护“和谐中国”形象的斗争已从传统安全延至非传统安全领域,显示了软实力较量在国家安全中的日益重要性。<sup>[19]</sup>因此,中国官方的补正性报道以及海外华人的爱国行动,充分表明我们在捍卫“北京奥运”问题上的中国话语权,中国人的媒介主权意识被激活,文化主权与话语权互为因果。因此,中国传媒应以奥运为契机,力争解决国家软实力建设中传媒发展瓶颈问题,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美]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论世界前景 [J]. 国际政治, 2005, (3): 110.
- [2]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4] Lance Bennett. "One Nation, One Mind" Vanity Fair December 2001, pp 176-182.
- [5] 陈卫星. 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 [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195.
- [6] [美]爱德华·W.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441.
- [7] 马丽蓉. 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 [M]. 时事出版社, 2007: 92-247.
- [8] 朱威烈. 《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总序 [J]. 阿拉伯世界, 2002: 4-5.
- [9] 李希光, 赵心树. 媒体的力量 [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 [10] [日]田中宇. “9·11”迷雾——美国政府反恐决策内幕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7.
- [11] 程曼丽. 两次海湾危机中的美国舆论分析 [J]. 中国记者, 2003 (3).
- [12] 国际政治中的媒体力量 [N]. 民族报 (阿根廷), 2005-12-25.
- [13] 马晓霖. 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 [J]. 阿拉伯世界, 2005 (1).
- [14]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 [J]. 阿拉伯世界, 2005, (4): 60.
- [15] 陈卫星主编. 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 [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 [16] 约瑟夫·奈. 2020年的世界 [N]. 金融时报 (英国), 2007-03-07.
- [17] 叶皓. 试论当前政府和媒体关系的变化 [J]. 新华文摘, 2008 (9): 11.
- [18] Bernard C. Cohen.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9] 中新网, 2008-04-16.

责任编辑: 和侃